

张骞墓考古发掘故事

——从《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说起

李小东

1938年张骞墓发掘后，西北联合大学在遗址旁设立了《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发掘主持者徐旭生、何士骥等学者，在公开刊文中将发掘张骞墓称作“整理”张骞墓。相较扎眼的“发掘墓葬”，“整理墓葬”似乎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

从“发掘”到“整理”“增修”，一词之差，显示在此次发掘的学术工作之外，还有着

发掘前的公共宣传

民国时期，张骞墓始终有张氏后裔保持香火祭祀，且受到当地群众和往来商旅的祭拜。由是，徐旭生等学者用“整理”代替“发掘”，主要是顾及张氏后裔以及当地群众的情感。毕竟一旦科学考古“发掘”到自家祖坟，总是引人不快，而自古民间素有修整祖茔的做法，以“整理”“增修墓道”的方式开展发掘，能够一定程度上安抚张氏族人的情绪。

为谨慎起见，何士骥等西北联大没有直接开展发掘，而是先清理调查墓前的石刻。

在此基础上，西北联大积极开展公共宣传，介绍此次考古工作。其一，何士骥等学者在清理墓前石兽时，专门为石兽垒出石座，向公众展示其考古工作旨在保护张骞墓。其二，清理墓前石兽的调查报告指出，当时所以认定此墓系张骞墓，主要根据清乾隆时期陕西巡抚毕沅的考订，但毕沅的结论只依据有限的传世文献。如需证明此墓确系张骞墓，则需要“揭开各个墓门，作全部的清理”“以不动原物，仅加扫除为原则。”如此一来，发掘工作不仅无损于张骞墓的威严，反而有助于打消坊间传言。其三，西北联大计划在发掘张骞墓后设立博物馆，最大限度发挥张骞墓的

社会意义，特别是“于今日一致唤醒民族意识，对外实行抗战之际，必有极大之裨益”。

与张氏后裔的交涉

1938年8月14日，西北联大校方专门招待张氏后裔中最为年长的张林庵，劝说其同意发掘。在此方面，何士骥等学者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极力褒奖张骞的历史地位，称其为“民族英雄”“东方之哥伦布”。其次，从张氏后裔的立场出发，解释修整张骞墓的必要性。因清理墓前石兽时发现雨水冲刷的洞，周围“封土，至为虚松，有一推即倒之势”，因而“整理”能够避免“不肖之徒，妄自出入，擅加损毁”。再次，保证张氏后裔全程参与张骞墓的“整理”工作。

8月18日，何士骥的考古引路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到达城固，指导张骞墓发掘。徐旭生一到城固，就专程拜谒博望侯祠，并会同西北联大学者及城固县官员再次会见张氏后裔。经过前期的说服，张氏宗人对发掘工作“无异议”，仅表示“近日有人(或系联大学生)到墓上，窃取券砖，要求出示禁止”，对此城固县及西北联大表示同意。

窃取券砖，对于张氏后裔而言是玷污先祖，而在徐旭生等学者看来则是破坏墓室的完整性。公众与考古学家双方虽然出发点不一定相同，但并不妨碍其达成谅解乃至共识。

发掘开始前的仪式

1938年8月24日，发掘工作开始。与其他考古发掘径直开展学术工作不同，在张骞墓正式发掘开始前，西北联大专门举行了公祭博望侯的典礼。“张氏后裔及张氏戚友数十人俱郑重参加”“并备鼓乐齐祭”。典礼按照张氏后裔、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城固县政府、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组、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顺序，分别向张骞墓致祭。

典礼“礼节隆重，鼓乐严肃，参观者亦多肃然起敬”“颇能引起一般社会对于乡贤之注意，故前往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于途”，甚至于“墓前及四围无隙地”。群众的围观，使考古工作现场变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此前在报刊上有关宣传，得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发掘现场的冲突

发掘中，张氏后裔每天亲临现场，与学者一道参与相关工作。徐旭生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判断张骞墓发掘“非十数日不办，而墓门高可及丈，又出余等意料外。”对此，张氏族人失去耐心，“提出抗议”。经过徐旭生等人“解释训谕，婉抗交涉”“彼等始允开墓门，去土入观。”27日晚，墓室外围砖被移去一部分，普通人可以“附身入墓”，但徐旭生则坚持“必去至如余身量之人可不俯身即能入始止”。在徐旭生的反复劝说下，张氏后裔同意打开墓室。

虽然27日白天徐旭生对张氏后裔反对打开墓室颇为不满，但在27日收工后，徐旭生独自一人在寓所，做了彻夜反思：“以学术言，吾侪有十分理；以人情言，张氏理由亦颇充足”“当学术与人情冲突时，只有取决于政府之法令。”

由于当时负责认证发掘资质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已于抗战爆发前停办，徐旭生等人的发掘无法获得法律上的认可，“故此日张氏如果阻止发掘，吾辈实无法言”。换言之，徐旭生认为科学发掘固然重要，但不能简单粗暴地以科学否定公众的朴素情感。考古发掘必须直达生土层，亦即将墓室一层层全部揭开，如此一来，势必严重伤害张氏后裔的情感。

故此，徐旭生决定“今日吾辈暂如张氏意，上面取土一层，入各室内一探规模，以为下次工作之预备，下层一切不做，亦未始非善法。”

次日，徐旭生先后征求了许寿裳、周国亭、何士骥等学者的意见，决定发掘到此为止。9月2日，经与张氏族人商议，决定封墓。

发掘后立碑纪念

发掘结束后，除学术方面继续开展出土文物整理外，徐旭生等学者仍持续开展公共宣传。

9月12日，徐旭生、许寿裳、何士骥，以及胡庶华、黄文弼等学者参加封墓纪念仪式。10月2日，徐旭生、何士骥与黎锦熙、吴世昌等学者专门开会讨论为张骞墓立碑，决定在碑上雕刻西域图、补校《张骞传》，以及吴世昌撰、黎锦熙书的碑文。由于发掘工作显然已经

不止于“整理”张骞墓的外部，为名实相符，碑名将此次发掘定位为“增修张骞墓墓道”。

纪念碑碑文不仅向张氏族人及公众解释了此次发掘的意义，特别是突出了激励各方爱国热情的意思。第一，相关工作有助于保护张骞墓，西北联大在发掘后为张骞墓“鳩工培土，重加封植。”第二，发掘中在“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时值抗战国难，张骞所代表的尚武精神“能御侮图强，货殖恣所取给者，胥有赖焉”，因而，发掘张骞墓有助于“立懦振颓，完复兴之大业”。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联大还计划“征收附近地十余亩，建议由西北师范学院在彼间办一博望附属小学，并附设一西域园，将可考从西域移植之植物，如苜蓿、蒲桃、石榴之属，尽量种植。”虽然此后囿于客观条件，此议未能实行，但这一设想已和今天公众所熟知的遗址公园颇为相似。

张骞墓发掘的公共考古意义

从考古学史的角度来看，张骞墓发掘的学术成绩相对有限。即便是那枚有“博望”字样的陶片，徐旭生与何士骥都持谨慎怀疑态度。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琮考证，此张骞墓并非张骞之墓。

张骞墓发掘所以被反复颂扬，更多源于其成功的公共考古实践。徐旭生及西北联大学者用“整理”替代“发掘”，起初不免是回应公众忌讳考古发掘的无奈之举。但在实践中，盛大的修整张骞墓仪式，吸纳张氏后裔参与发掘工作，在发掘后为张骞墓厚培封土、增立纪念碑等方式，不仅起到了调和科学发掘与公众情感的积极作用，更让公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张骞墓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基于张骞墓发掘中的公共考古，张骞墓的关注度得到了大大提升，成为公众缅怀民族英雄、树立抗战必胜信心的公共文化场所。

时至今日，《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历经近百年风雨，仍矗立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饶家营张骞墓遗址，默默诉说着张骞出使西域和西北联大师生学术救国的故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展痕
处处
LVHENCHUCHU

知民意通民心的“三府太守”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后烧村，有一座建于明朝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的古墓，墓道牌坊上雕刻着“厥绩益懋，令誉孔昭”，彰显了其主人——“三府太守”陈健不凡的身份。

陈健是同安翔凤里阳翟社(今金门县)人。明嘉靖丙戌(1526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廉州知府等，因此被称为“三府太守”“三郡知府”。因其终生以清廉公正自持，知民意、通民心，每任皆有政声，从朝廷到省、府、县地方官都曾为其立牌坊，因此被传为佳话。

陈健出身穷苦家庭，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辛并致力于改善民生，任廉州(今广西合浦)知府时，曾组织教授当地边山区侗族等少数民族百姓学习耕织本领、增加收入，并且亲自传授闽南的先进生产技艺。合浦临海，陈健积极扶持民众发展海水养殖业和珠贝生产业，提升生产技艺和规模，经过多年发展，合浦的珍珠被称为南珠，素有“掌握之内，价盈兼金”之说，史学家认为，今天合浦成为闻名遐迩的南珠之乡，陈健功不可没。明代倭寇猖獗，时常从海上进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陈健还在合浦设地方武装团练，防抗倭寇，保一方平安，取得显著成效。

陈健调任南宁知府后，该地发生了土司兵卒在城郊劫掠掠夺事件，陈健的上司误判为土司叛乱的恶性事件，打算予以严惩。

陈健经过认真周密调查，查清了事情真相是上差旗牌官贪赃敛财、实施抢劫，并非土司叛乱。于是，他严惩了肇事的旗牌官，平息了事变，维护了团结。当时，南宁官方频频用民船运兵、运物资，也经常借此欺压、敲诈商民，百姓叫苦不迭。陈健得知此事，顶住压力将实情奏请朝廷，终于获得批准：南宁不再派遣民船调兵，改由朝廷发军队行军至潯州的粮饷，每个士兵再加给犒劳，从此免除了南宁船户和商民之苦。当地百姓深深感激陈健为民作主的陈健，称其为“青天”。

陈健长期在外任官，却也时时心系家乡百姓，为同安做了很多民生改善之事。1527年，陈健发起募资修筑埔尾的“沧江坝”，蓄江溪水灌溉农田百余顷，有18个村庄受益，400多年过去了，沧江坝的溪水仍然灌溉着同安的部分农田。同安莲花是典型的山区，当年这里的山民生活十分艰难，为了方便百姓耕作以及下山经营，他捐资开筑了两条共20多公里的石道，沿途还修建了凉亭供百姓长途跋涉时歇息，深得百姓赞誉。

“松杉雨露千年翠，冠冕声华百代齐。鹤笑海天巢石榻，笑看夕阳未还西。”这是他生前为自己墓园题的诗句，透露着其洒脱、豁达、儒雅的心态，也是其一生效政廉政、清清白白为官的写照。

花开太平世，美在新时代

于非闇极其推崇写生，他认为民族绘画的花鸟画其传统就是写生。从象形文字的创造到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再到齐白石的花鸟小虫，花鸟画的独特创作方法源于对生活的深入与深入的观察。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写生的熟练，用凝练的笔法捕捉瞬间动态，创造出“又真实、又概括、又生动、又得神”的作品。这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捕捉黄鹂的动态，于非闇曾尝试饲养黄鹂，但由于当时的饲养条件困难，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转而从饲养其他几十种鸟类，捕捉它们鸣、食、宿与飞翔的动态。老舍在《悼于非闇画师》中也谈道：“即在晚年，虽已成名，可是还时刻留神观察百虫鸟，以求精确。每逢公园牡丹盛开，或某处园有菊花展览，他必去详为观赏，勾画底稿多幅。”于非闇自己也在笔记中记述：“临进大觉寺的白玉兰，比颐和园的又高又大，后面衬着阳台山，更显得它有玉树临风的美。”想必，画面中婀娜多姿的玉兰，或也“采撷”自此，映照着于非闇先生流连忘返的足迹……

作为一幅经典花鸟画，《玉兰黄鹂》不仅具有美学上的价值，还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玉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纯洁和高雅，是玉树临风的精神写照。黄鹂鸟与农时有关，是春天的使者，象征着吉祥和喜悦。画中西兰花盛开，无限生机；黄鹂一飞一落，对话欢唱，画家通过这两个元素的结合，在“尽其精微”中追求“意境高远”，创造出一种超越现实、富有诗意的意境，传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情，也寓意着美好的生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此外，《玉兰黄鹂》还体现了于非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鸟画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式，更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艺术家，于非闇在继承传统绘画技法和审美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将自己的“创立新意”融入作品中。花开太平世，美在新时代。《玉兰黄鹂》既保留了中国传统花鸟画的精髓，又融合了现代艺术的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精神。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

《玉兰黄鹂》的故事

杨子

《玉兰黄鹂》是中国现代著名花鸟画家于非闇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中国美术馆。这幅画以其精湛的工笔画技法和艳丽秀雅的古典画风和充满诗意的意境，展现了中国传统花鸟画的魅力。

仓庚于飞，熠熠其羽

玉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高洁和纯美，常被用来比喻品德高尚的人。在北方，玉兰花在早春时节绽放，其姿态犹如玉树临风的春之使者，展现出高贵而优雅的美。仓庚，又称黄鹂，《诗经》中有云“仓庚于飞，熠熠其羽”，其美丽的羽毛和悦耳的鸣声，常被用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和大自然的生机勃勃。

于非闇在创作中将玉兰和黄鹂结合起来。画面中，一枝白玉兰倾压低垂，新枝上挺立的花骨朵悠然绽放，如同一位温婉的佳人轻轻俯身，芳香袭人。花枝上，一只美丽的黄鹂抬头仰望，仿佛在倾听天籁之音。而上方，另一只振翅高飞的黄鹂，似乎在空中回旋，与下方的黄鹂遥遥相对，构成了一幅美妙祥和的春日图景。画面以石膏作为底色，不仅突显了玉兰花的洁白和黄鹂的鲜艳，还营造出一派蓝天映照下晴空万里、鸟语花香的和谐氛围。这种色彩的组合运用，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春天的明媚和生机。构图主次分明、疏密有致，画面斜向对角线交相呼应，形成一静一动的视觉张力。

在绘画技法上，玉兰和黄鹂的刻画张弛有度，细腻而不失笔力，填色柔婉鲜华，不因艳俗。画家运用勾勒罩染的技法，使线条和色彩相协调，整个画面既保持了一丝不苟的精准，又不失灵动。画面右下所题写的“仓庚耀羽玉树临风”，体现一种诗意与典雅的意境，更展现了中国传统绘



《玉兰黄鹂》 中国画 于非闇 作 1956年 中国美术馆藏

画中追求和谐之美的审美理念。

于非闇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1935年起专心研究工笔花鸟画。他师法自然，喜好观察研究花草虫鸟，通过反复写生，体察物理、物情、物态，使其所描绘之物，栩栩如生、细致入微；他重古意，其绘画深受明末陈洪绶的影响，并对北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推崇备至，在书法方面，早年学习晋唐楷书，后期专攻虞、褚体，晚年以瘦金体著称，因此其书画风格承宋徽宗一脉。他不仅学习卷轴画，还研习宋代缂丝古拙的装饰手法，以及民间绘画中的优秀技法，使得其花鸟画作品具有独特的装饰性。代表作有《玉兰黄鹂》《丹柿图》《和平鸽》等。另著有《非闇漫墨》《中国画颜色的研究》《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等。

《玉兰黄鹂》是于非闇晚年之大成之作，创作于1956年。这幅画作为以玉兰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实物入藏国家博物馆

本报(记者 付裕)日前，“中国三峡集团捐赠白鹤滩水电站实物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仪式”在国博举行。

据了解，这批实物从档案资料、仪器设备、服饰徽章以及音像制品等多个角度系统全面地展示了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的各个环节，是我国水电事业发展迈入新征程的实物载体，也是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代表性物证。

2023年，中国三峡集团决

定将白鹤滩水底石切片、首批机组发电仪式入场证以及自主研发的新型低热水泥样品等110件/套实物无偿捐赠给国博。

中国三峡集团依托三峡工程而生，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

白鹤滩水电站是全球首个单机容量百万千瓦的水电站，是“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这批实物入藏具有重要意义。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明代竹刻松树小壶



明代竹刻松树小壶，高10厘米，径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竹刻松树小壶呈天然树桩状，制于明代万历、天启时期，是濮仲谦的众多精品之一。

此壶根据材料自然形状，采用深浮雕技法，以一节老松树干

作为壶身，一侧有枝沿树身盘附而上蟠屈成柄，断梗作流。

此壶盖巧雕成枝叶状，曲折如钮且又与壶身枝干相连。树身苍老屈曲，满布鳞皮，并配以枝叶，精致古雅。